

## 曾 序

精神分析学的开山祖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里，运用日常生活常见的语误、遗忘等现象，来说明潜意识的存在；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则运用潜意识的产物——梦的内容——告诉我们怎样去了解潜意识境界里的原本思考法则；而《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及其他有关的论文所讨论的是性异常的病理、心理发展（psycho-sexual development）的过程原欲理论（libido theory）以及原欲在人类行为中种种形式的表现，阐明了他对于“性”的主要学说，乃是凡有志于学习人之心理及行为的人士所必读的书籍。

“性”在我们的人生里占着很重要的一环。可是自古以来未曾有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清楚其真相。弗洛伊德透过精神分析的技巧，运用治疗病人的实际资料，把性的问题做了一番有系统的分析、研究，并阐明了他的性学学说。他把性的问题分为性的对象、性的目的、性的表现方法等几个方向来探讨。过去人们总认为各种“性”的异常，如同性恋、恋物症、虐待症等是无可理解的病态。经过弗洛伊德这一番有系统的分析和解释，我们才了解所谓性异常者乃是在其“心—性发展”的过程当中曾受过挫折、发生障碍而停滞、固定在早期、幼稚的阶段，或者把早期有过的性对象、性目的或性的表现方法做部分性的扩大表现而已。如此一来，我们不但马上可以了解，所谓性异常与正

常之间原本相差无几，同时也可以寻找到治疗性异常的途径。

精神分析的学说，其主要学理乃在说明人格发展过程当中，其“原欲”，经过“口欲”，“肛门”“性蕾”同性，及“异性”各阶段的层次发展。一方面说明一个人在婴孩时期即有性之雏型表现，另一方面也阐述了人格发展的顺利与否，往往会决定日后的表现是否正常。从精神分析学的目光看来，人的基本欲望，所谓“原欲”，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而行使其功能。他们认为心性发展有问题的人，如果用较退化的性行为方式来表达其性欲望时，便形成“性异常”现象；如果采取变形的方式，运用一些心理自卫机转来处理其心性问题，则造成“心理症”，如焦虑症、强迫症、歇斯底里症等等。

精神分析学家的学说，从开创当初即常被批评过分强调“性”的重要性。这是一件值得检讨、澄清的事情。从生物学的立场看来，性欲与食欲乃是生物的基本欲望，为个体的生存与种族的延续所不可缺者，“性”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是无可否认的。再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感情都比不上与性、爱情有关的情感来得那么强烈而具影响力。更自临床的眼光观之，一个人在社会里可以谈论许多问题，却不容随便讨论性的问题。“性”是一种禁忌。人们有了这方面的问题，常处于无知、误解和疑惑的状态。一旦置身于精神科医师之前时，其衷心所关切者也就无不涉及于这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在精神分析的过程里，常会发生一种“阻抗现象”，即病人常易拒绝接受可能使他不舒服的解析。以“性”为中心的学说，不仅使一般人士容易产生这种

“阻抗现象”，甚至许多精神医学家也会身受此一“阻抗现象”之扰，而不能接受整个的学说。基于此，晚期的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已有所修改，强调“原欲”乃是人之基本欲望的总称，避免以狭义的“性欲”去解释它。

此外弗洛伊德对“神经衰弱”的病理所作的假设，目前看来已属不确。弗洛伊德原认为一个人会头昏、脑涨、全身无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欠佳等等，乃是神经“衰弱”所致。他假设这种衰弱与“性”有关，即因性的不正常发泄或手淫过多而产生某种毒素，使神经衰弱。如今这种假设已不再被接受，甚至在医学界里已不再使用“神经衰弱”这个病名，而改用“衰弱型心理症”一词，强调这种病症的产生乃是心理过分紧张及疲乏所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假设，一个学说，常常需要接受时代的考验。错的要被淘汰、修改，对的才能被保留、引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帮助我们了解性异常的形成，也帮助我们了解人格的“心—性发展”，其贡献是无法衡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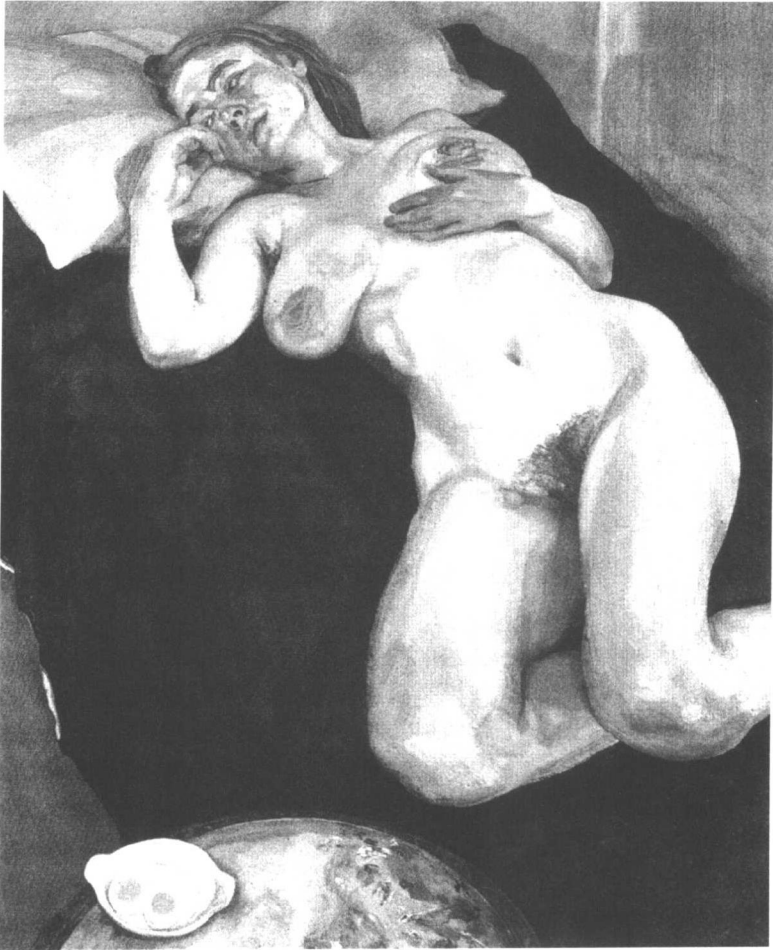
这次林克明君继《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之后，再接再厉又把《性学三论》及《爱情心理学》翻译出来，推介于读者面前，其精神实在可佩。本书书末附上本人拙著《谈性异常》一篇，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方面的关心及认识。

曾炆煌

1971年3月于台大医院精神科



# 性学三论





## 引 言

“无疑地，除了《梦的解析》之外，《性学三论》乃是弗洛伊德对人性的了解里最具创意、最能永恒的一项贡献。”本书乃是弗洛伊德阐明人类性欲之本质与发展的主要文献。然而，精神分析学虽早已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思想背景的一部分，大多数一般读者对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依然只有肤浅的了解。故而，以普及本之形式发行这些论文是十分必要的。对职业性的心理治疗者本身而言，回顾这些论文更绝非多余；因为不管在美国或欧洲，不少专家正刻意于忽视“性”（Sexuality）及其造成心理症之能力。

我们知道，达尔文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新的宗教：共产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如果说前者以其强迫性的整齐划一而闻名，则后者当以其众说纷纭为特征。许多这类的“异端”，或者乖离弗洛伊德理论，或者加以修改，类皆源自对于弗洛伊德性学理论的不满，他们反对弗洛伊德不管在个人或社会方面，皆强调“性”为人类行为之根本基础。当荣格<sup>①</sup>、A·阿德勒<sup>②</sup>、奥图·峦克（Otto Rank）——所有弗洛伊德知名的早期弟子——叛离弗洛伊德，放弃其部分理论时，他们的异议主要针对的乃是弗洛伊德以“性”为中心的看法。许多其他私淑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学家，常把他的理论改头换面，同样地也是因为他们不能同意弗洛伊德的过分强调本能，特别是性本能的地位。

这三篇论文构成了弗洛伊德毕生成就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其中，他提出了他的学说的重点，认为心理症之成因，乃因患者之后天经验迫使他留恋其婴儿期的性活动，一个人若能通过幼儿性欲的诸阶段，将之抛诸身后，他才得以成熟而正常。心理症患者难以忍受这种历程。他常以多样的伪装保存幼年的性态度及性行为，或竟回归于某些婴儿型的性表现。弗洛伊德心目中对人类的成长既然存着这么一幅景象，他自然会对孩童的性发展发生莫大的兴趣。

然而，弗洛伊德当年的知名人士，多半把小孩当作是特别纯洁的生物。而如果一种生物沾染了性的色彩，你便再不能说它“纯洁”了。诚然，基督教的洗礼，原本意味着要从尘世、从肉体、从恶魔手上把婴儿救赎出来，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人们多已遗忘其原意，只把它当作是徒具姿态的仪式而已。除了躺在摇篮里的婴孩，或偎依母亲膝傍步伐不稳的孺子而外，世上还有什么堪称天真纯洁的呢。暗示婴儿吸吮母奶之时，也吮入了原欲的乐趣，或主张当孺子闹脾气时，其中包含多少喜怒、多少辛酸，这种说法，如钟士（Ernest Jones）所说的，“对育婴室里的天真无邪气氛会是多可怕的毁谤。”

然而，斯汤达尔<sup>③</sup>在他那取名《亨里·布鲁拉德的一生》的自传里，便曾生动地描述当他小时候，尚在襁褓之中，母亲怀里，他曾如何地嫉妒任何亲近母亲的男人，尤其是那个显然与她有合法关系的男人。我在此摘录书中的一段：

我的母亲茄格农夫人，是位迷人的女性，我深爱她。不幸在我七岁的时候便失去了她。

当我六岁（1798）时，我爱她，我爱她的情形，就和我后来在 1828 年爱上 Albertae de Rubempré 时之疯狂热情一模一样。事实上我追求幸福的方法一直未改变，只有一点例外——当时我在肉体之爱方面与凯撒同病相怜。凯撒若复生于今日，大约除了动用大炮或短枪，也没有他法可想。不过这个差别，倒不是那么重要，而我的作风根本上一直是相同的。

我愿母亲不着衣物，我愿吻遍她的全身。她热爱我，常常吻我——对她的吻，我常如此热情地回报，以至她不得不躲开。我总是想要吻她的胸乳。你能想像吗？在我小时候，还不到七岁，我爱过她。

但是当弗洛伊德在 1905 年初版这三篇论文时，小说家斯汤达尔才刚开始受人注意而已；被那位锲而不舍地探索着的维也纳医师的理论所震惊的读者，当然也受不了这位法国小说家。

虽然弗洛伊德这些理论发表在一个远比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美国（当狄奥多雷·罗斯福总统<sup>④</sup>的女儿艾丽斯谣传吸了一根香烟时，美国举国哗然）更不受拘束的社会里，他所面对的听众，不管是同行或门外汉，对“性”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性”是人身上最难控制，故而也最需系勒的力量。

然而，尽管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纵容”的呼声带来了如许的改变，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对“性”依然是害怕的。西方社会恐怕再没有一个地方改变得比美国更多的了；“性”之被滥用于商业市场里，也再没有别的地方会如此地泛滥，但是我们所以会这般乐于使用“性”

来推销广告肥皂或汽车，恐怕是因为我们想使之屈服于市场之下，而不再显其破坏性的威力。在名义上我们对性的态度已经解放。除了几个有着苛刻的超我，律己甚严的上一代残存者之外，性之表达已被视为当然。男人理应是色眯眯的，中产阶层的女人理应对性有反应，甚或乐之不疲。我们的谈吐越来越直率。我们的举止随便，却不见得更轻松自在。几乎性行为的每一细节如今都任由小说家自由自在地处理。剧作家笔下，再没有什么字眼或动作会遭禁止。便是美国的电影制作人也越来越习于以更写实的手法描绘“人生真相”。

但是，美国社会虽然似已从某些往日盛行的禁例和限制里挣脱出来，过去的阴影依然影响着我们对性的态度。诚然，最近流行的见解，相信性是正常的，甚至是人生中颇值得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听听性学“专家”的演讲或读读他们的畅销书，你会发现他们对题材的处理是多么地肤浅，似乎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性是怎么一回事。

故而，甚至在今天，当一般人听说“性”并不始于青春期时，他还会觉得很不高兴。美国的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乃至社会学家们一向甚为关切孩童及青年之心理。（顺便一提，在 1909 年邀请弗洛伊德访美演说的便是史坦利·霍尔 G. Stanley Hall，美国研究青年及其心理的先驱。）他们深知少男少女通过青春期，成长的过程里会经历多少焦虑不安；他们相信初人大千世界的青年，乃是一个自我的寻索者；青年们应付性成熟后所发生的问题时，如何地尴尬难堪，他们也很能了解。

所有这些牵涉到的乃是青年所深深关切的问题，那便是一个有价值的自我之追寻，这种情形艾力克生（Erik H

• Erikson) 称之为青年特有的“自我认识危机”。当然，在任何社会里每一个年轻人都得面对此种危机，但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变动剧烈的社会里，面对此事更是分外地困难。当古德曼 ( Paul Goodman ) 描述“成长之荒谬”状态时，他所关怀者原概括了一切的青年问题，但是在我们这动态的社会里，青年欲扮演恰当的性之角色，几乎比职业之选择与工作之持续尤为困难。例如，贝特海 ( Bruno Bettelheim ) 便曾比较我们的工艺化社会与其他生活得较为单纯的社会里，人们对性的态度及期许间之异同：

在某些社会里，科学知识尚未影响妇女之地位及其期望，她的性生活远比文明社会之妇女单纯。只要她的情人或丈夫乐于与她行房，她便心满意足；她从不担心自己是否性冷感或能否到达高潮，很可能她不知高潮为何物。男方未受制于古老传统或新知识，并不在意女方是否经验了高潮，故可纵情于斯，到达高潮，如此反而能促使她也获得同样的体验。

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止男孩需在其性伴侣身上测知自己的性能力，女孩也有相同的需求。如此一来，男孩必须女友能经历所谓的“高潮经验”，才敢相信自己算是个男子汉；女方的情形更糟。她不但必须使他经历高潮，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她还要自己有这种经验来证明自己是个女人，不然她便要害怕自己是个性冷感者。性交如果还要承担这么多心理上的压力，要证明这么多东西，便难保变得索然无味。

既然人们生活的外在情况已与弗洛伊德时代大不相同，

今天的心理治疗家们当然必须面对某些当年弗洛伊德所不曾面临的问题。但是治疗家们仍需力求理解性发展的过程，而对于此一过程，弗洛伊德的描述与分析依然是个中翘楚。每一个与青年为伍者——教师、父母、社会工作者、行政官——或每一个想多了解成人（包括他自己）的人，都应熟知弗洛伊德的分析。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对性的根本发现已横遭阉割。精神分析学虽盛行于美国，世人所接受的是他的悲观主义，至于他所珍视的原欲理论，即使未被新弗洛伊德诸学派所弃绝，也已久遭忽视。弗洛伊德理论的固执性、严重性，他执著于逻辑推论时的勇猛不屈，特别易使美国人感到惴惴不安。在繁荣的二十年代，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敢于表露其对美国文明的忧虑。其后经济恐慌与战争更使得美国人不愿面对弗洛伊德理论所蕴含的灰色信息。萨特<sup>®</sup>如此写过：

童年乃是在偏见的死巷里摸索；童年有如套上了马勒的小驹，感觉环境之限囿，有如缰绳之紧勒，横冲直撞，企图挣脱。今日，惟有精神分析学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当孩童在黑暗中摸索，试图有所作为，而每每与其一无所知的成人世界之社会力量相冲突时的辛酸历程。只有精神分析能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已迷失于其扮演的角色里，不管他试图规避，或想将自己完全同化于其中。只有精神分析能告诉我们一个成人的全人格，那便是说，使我们不但认知他现在决定其方向的力量，也了解其既往所赋予的重担。……无疑地，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偏见、观点、信

念皆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因为它们早经决定于童年的经验。我们的非理性反应，我们对理性的无理抗拒，至少有一部分得自我们童年的无知，我们当时的无限惶惑。既然如此，这容易造成固置（fixation）的童年，为什么不该令我们深深地关切，力求了解呢？

但是当代的美国人却相信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包括逃避童年的影响力在内。他们多数仍相信孩童是一切善良之源，而非多向性性变态之雏型。所以，虽然美国人早就了解精神分析疗法的潜在力量，他们却宁取他种更加美国风格的理论——有如罗格（Roger）的“病人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支持性，与“顾问性”疗法之成长，“团体精神疗法”之赢得兴趣，以及许多牧师对精神分析的片段性接受在在指出美国大众多么地切望去稀释弗洛伊德。

但我还要重新提醒，这些方法多半不看重性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幼儿性欲的影响力问题。当《性学三论》的英译本初版（1910）时，卜特南教授（Professor James Putnam）在引言里指出当时人们对性行为之研究所持的敌意态度。五十年后的今天，你会发现，虽然精神分析思潮的冲击，许多美国人本分地假装拥有宽容的性态度，这个看似开通的社会仍不愿坦率地、明智地谈论性行为的问题。虽然色情的文章，肤浅的作品充斥市场，对于性变态的本质与来源之坦诚讨论依然是一种禁忌（taboo）。精神分析家发现人们对性偏差无知得可怕，而社会科学家在公众的歇斯底里发作之中看到这种无知。“色情狂”常是报纸的头条新闻，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地无聊；甚至晦涩的古典小说加

上了“性感”的封面，便也能畅销。性等于犯禁，等于肮脏，这种看法依然潜伏在多数人心里，使人不免相信弗洛伊德在这三篇论文以及其他作品里所表达的对人类性行为之洞见睿智，或者完全未被接受，或者被十分地扭曲了。对于反常性行为迄今缺乏认真的社会学探讨，尤其对同性恋的第一手社会学研究材料一直付诸阙如，由此，我们或可间接明白何以社会科学家对最近数十年美国人性格的转变一直未能有更多的了解。

前面所述，并不就间接意味着对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分析理论之诋毁。相反地，哈特曼（Hartmann）的“自我心理学”、安娜·弗洛伊德对自卫机转理论的贡献，弗洛姆（Fromm）从文化观点入手，对心理分析学的解释，乃至存在主义学派的洞见对心理症之动态病理的更加了解及治疗之成功，皆有莫大之贡献。我们不易了解所谓“正统”的弗洛伊德理论与注重“文化”因素的学派之间何以有偌大的差距。如果我们能更强调精神分析主流诸学派之间理论上的相同成分，而少注重他们的相异之处的话，精神分析家与病人想必都能受益匪浅。

在这三篇论文的第一篇末尾，弗洛伊德说：

“如果我们相信，心理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患者依然保留，或回返于幼儿性欲之状况，我们便会对幼儿的性生活发生兴趣，从而追索那些控制着幼儿性生活发展历程的影响力，以了解究竟为什么，它们有的形成错乱现象、心理症，有的却能享有正常的性生活。”

但是新的精神分析学派，常有意忽视幼儿性欲的重要性。不管在学术上或在病人的治疗上，我们都因而受害不少。诚然，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里，个人必须扮演更多复杂的角色，而他又常面对这些情况不知所措，此时治疗必须导向新的方向，以帮助他们去处理其问题。社会诚然会改变病人。无疑地，当代病患之症状，其特征与从前接受弗洛伊德治疗者大不相同。许多病例甚至连其动态病理皆不易摸清。模糊不清的“边缘症”（译注：介乎精神病与心理症二者边缘之病症）似乎有增无已；面对这类病例的治疗方法，治疗的新方向，病人与分析家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都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如何，这并不至于就减少弗洛伊德对原欲理论之独创性发现的重要性。反对它的人，提不出丝毫恰当的替代品。自弗洛伊德发表了刊行于本书之中的基本概念之后，关于“性”的发展，也不曾再有任何重要的新理论出现过。

同样地，虽然像金赛博士的性行为报告及毕伯（Lrving Bieber）最近的同性恋报告等等的研究指出异于传统的性活动在现代人的生活里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研究只严谨地针对可见的事实，于“性”的理论实无多大助益。而且，事实上即便在有形的个案研究方面，较之十九世纪的辉煌成就，诸如克拉夫特·伊宾（Krafft-Ebing）（病态性心理 psychopathia Sexualis）、希区费德（Hirschfeld）（性异常及错乱 SexualAnomalies and Perversions），甚或艾里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Sex），我们也未见得进步多少。所有上述对性异常的讨论，都是在一个我们认为十分假道学的年代里出现的。

弗洛伊德对于恋物症（fetishism）、虐待症（sadism）、

被虐待症（masochism）这类变态现象的讨论仍有其根本的重要性：《恋物症》（1927）《小孩被鞭打了——对性错乱的起源之研究报告》（1919）及《被虐待症的利益问题》（1924）都依然是经典之作。他对男性同性恋的了解可能算不得是盖棺定论。苏利文（Sullivan）、荷妮（Horney）及拜考斯基（Bychowsky）对同性恋的观察，皆不容忽视。由于对同性恋的成因与治疗缺乏大规模的调查，我们难免怀疑，较诸现代分析家对文化因素的看重，恐怕还是弗洛伊德及其同伴的看法更接近真相。弗洛伊德的观察所得在今天依然和他初发表这些论文时一样地有用。在性倒错——这是弗洛伊德对同性恋的称呼——的例子里，患者对其母亲产生极早的“固置”作用，其后便“仿同”于其母亲对男性感到兴趣。这个弗洛伊德的公式依然能帮助精神分析家处理同性恋病人，解释同性恋的问题。

文化状况的变动诚然会大大地改变人们对性的态度和期望。但是性冲动及其诸种含义，如弗洛伊德在这三篇论文里所提示者，则历久弥新。这样子倡言性本能的安定性，可能使近年来许多注重文化因素的分析家迷惑和不悦。他们无疑地已充分了解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剧变对青年及成人有重大的冲击力量，但是当它们专注于这些剧变，以之为治疗中心的时候，这些文化派分子常易忽略弗洛伊德在此所讨论的基本动态病理。

重新发行《性学三论》的意义，便是想改正这项错误。一般读者若能熟悉这些论文，就能明白时下对弗洛伊德性学概念的肤浅见解，与夫弗洛伊德在此所表白的事实真相，有着多大的差距。透过对这些概念的熟悉，读者对自己乃至他人，可以了解得更深刻。许多年来，弗洛伊德

的成就一直是刺激着社会科学成长的一道泉源。重复这份有着根本重要性的探讨，你会发现这道泉源并未枯竭。

鲁田贝克 (Hendrik M · Ruitenbeek)

1962 年 4 月于纽约市

#### 注释

荣格 (C. Jung, 1875—1961)，精神分析大师。

②A. 阿德勒 (Alfred Adler, 1870—1937) 著名心理分析学家。

斯汤达尔 (Stendhal, 1783—1842)，法国小说家、批评家，著有《红与黑》、《恋爱论》等。

狄奥多雷·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美国第 26 任总统，亦称老罗斯福总统，以与二次大战内去世的侄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 区别。

⑤ 萨特 (J. P. Sartre, 1905—1980)，法国哲学家、小说家。